

<<问学谏往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问学谏往录>>

13位ISBN编号：9787807078418

10位ISBN编号：7807078413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黄山书社

作者：萧公权

页数：2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问学谏往录&gt;&gt;

## 内容概要

《问学谏往录》是作者从华盛顿大学退休、结束42年的教学生涯后，为追述毕生求学、教学经历而作。

全书20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介作者的家庭背景；第二部分描述作者的求学经历，向读者展示了作者从私塾、青年会中学到清华大学、密苏里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艰辛的求学历程，为作者一生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描述作者的教学经历；从南开、东北、燕京，清华辗转在成都大学，最后受聘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直至退休。

他渊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以及先进的教学方法，使之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第四部分为作者对中国教育发展和实行宪政民主的相关探讨，表达了一位不愿从政的学者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与期盼，传达了一位政治学家的爱国情怀。

萧公权精深博厚的学术思想，细密笃实的措辞行文，精辟入里的史料分析，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是罕见的。

本书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反映了大半个世纪的学界风云和时代风貌，从家庭婚姻、教育出版、治学门径、政治理念、民族情感和人格修养等诸多方面向读者系统展示了一位学人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为研究作者的学术思想和意义提供了最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一部难得的学人回忆录。

原书1972年1月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收入其“传记文学丛刊之十九”。

本社此次出版，所作的编辑工作有：1、将原书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2、对原本中各种姓氏译名、各种地理译名予以原译保留；3、本书对原本中汉字数字不予变用阿拉伯数字，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再统为汉字；4、原书中凡“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以降诸年，一律将原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5、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书中台湾当局有关单位名称也作了技术处理。

6、由于作者政治立场原因，本书作了极个别的删节，并注明所删字数（不包括标点符号）；即使如此，本书现存文字之意旨、观点等，也偶有不妥之处，但鉴于为读者提供较完整资料，不便一一说明，所以一概保持原状，相信读者会一一甄别明鉴。

## <<问学谏往录>>

### 作者简介

萧公权（1897-1981）是上世纪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江西南安(今大庾县)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专攻政治哲学；在康奈尔大学以《政治多元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一直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历任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四川、光华、台湾、华盛顿等大学教授。

在教授政治学、法哲学、中西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的同时，著述颇丰，主要有《康有为思想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多元论》、《宪政与民主》、《中国乡村》、《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等。

1948年4月萧公权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问学谏往录>>

书籍目录

引言一、家乡与家世二、蒙师与业师三、青年会中学的师友四、清华两年的收获五、问学新大陆（一）·密苏里大学的三年六、问学新大陆（二）·康乃尔大学的三年七、归国途中八、上海六个月九、教学相长（一）·南开东北燕京五年半一、教学相长（二）·清华五年一一、漂泊西南（一）·从北平到重庆一二、漂泊西南（二）·糊口于四校一三、漂泊西南（三）·成都九年半一四、何莫学乎诗（一）·谊兼师友的吴雨僧一五、何莫学乎诗（二）·朱佩弦及其他诗友一六、是亦为政（一）·谈教育一七、是亦为政（二）·谈宪政民主一八、转徙东南一九、万里寄踪（一）·华盛顿大学十九年（上）二、万里寄踪（二）·华盛顿大学十九年（下）结语后记

## &lt;&lt;问学谏往录&gt;&gt;

## 章节摘录

一、家乡与家世 我们萧家的祖籍是江西省中部偏西位于赣江西岸的泰和县，但我却出生于江西南部离梅岭不远的南安县（今名大庾县）。

那时先祖父星北公任南安县教谕。

先父丕侯公，先母汤夫人和两位未出嫁的姑姑随侍在任所。

我出生的日期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一月初六日，当公历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民国三十七年夏末我在南京办理出国手续，外交部的职员在我的护照上把十一月误写作十二月。

我只好将错就错，把生日改晚一个月。

）先母生了我约一个月，不幸便病故了。

这没有母亲的婴儿由两位姑姑带养。

不久以后先祖辞官回籍，两位姑姑先后出嫁。

到我六岁的时候先祖弃养，先大伯父唐侯公，先四叔烈侯公，先五叔威侯公从四川省奔丧回籍，会同先父办理丧葬大事。

大伯父见我乏人领带（先父尚未续娶），他那时还没有儿子，商得先父同意，于丧葬完毕后带我同他去四川西部的崇庆州（两年后搬到川东的重庆“巴县”）。

于是我便永远离别了故乡。

因为我久居重庆，至今说话还带着一点川东的口音。

泰和的“方言”虽能听懂，却不会说。

无怪有些人误认我是四川人了。

泰和县北门外和西门外的乡间有两个同姓不同宗的萧族。

我们这一族世居县西的千秋乡上田村。

照族谱的记载，我们的远祖是西汉第一任的宰相萧何。

（其实年湮代远，这是否事实，无法确定。

）居住在河南省的后裔，于北宋末年南迁，在泰和县落籍。

上田村地势不高，赣江每三五年泛涨一次。

村里的住户（全是萧姓族人）照例避居楼上，水退之后才能下楼。

好在准备有素，因涨水而受到的损失并不严重。

这种楼居避水的生活我尚约略能够想起。

上田萧族人口众多。

村中的建筑各房各家大小不一的住宅外，还有几座合族及分房的祠堂，和族曾祖蒲邮公创议兴建的藏书楼一所。

据梅谷教授Professor Franz Michael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之后，浙江大学避寇内迁，曾在泰和县停留了一些时候。

随校迁徙的教职员学生借用上田村萧族的“公”“私”房屋作为临时的教室和宿舍。

（他那时在浙大任教，后来到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

）我们的族人多数守着传统习惯，或耕或读。

“治举业”的虽大有人在，但中乡举或进士的却为数无多。

我的一位族兄（名焱文）读书“过目不忘”，经史百家的书籍，多能随口背诵。

但十几岁“入学”以后便“困于场屋”，毫无进展。

先祖父“人泮”以后，屡试不第，因此绝意仕进，并鼓励子侄辈弃儒就商。

萧族在“功名”上虽少成就，在商业上却有不寻常的发展。

嘉庆道光年间有几位祖先开始沿长江西上，远入川西，往来贩运各地物产。

长期努力经营，业务逐渐扩大。

到了光绪中叶，“怡丰号”成了一个著名的商号。

华西华中各地（包括重庆、汉口、长沙、扬州）都有分号。

怡丰号除大规模运销长江上下游各省出产的重要商品以外，也兼营淮岸官盐的运销。

## &lt;&lt;问学谏往录&gt;&gt;

我的儿童时代正值业务盛极将衰的时期。

这坐落在重庆城内陕西街的商号只经营大宗批发，并不做“门市生意”，因此怡丰号的建筑格式与一般商店不同。

这是一幢广庭深院，高楼大厦的建筑。

前门开向陕西街，后门开向曹家巷。

重庆是一座山城。

曹家巷的后门是在最后一进房屋二层楼的背面。

前几进的房屋是重庆分号的“办公室”、“会客室”、“餐厅”，和“店员”、“学徒”、各项仆人等的“宿舍”。

后几进的房屋是分号老板（经理）和家属的住宅。

光绪三十年（一九一四）大伯父由崇庆州分号经理升任重庆分号经理。

我随着他全家迁居陕西街的住宅，直到宣统元年（一九一九）怡丰号决定歇业，才搬出去，在城内玉带街马家巷一处较小的宅子居住。

陕西街住宅最令我留恋的地方是最后一进三楼左侧一个面积十余方丈宽大平坦的“屋顶花园”。

天气晴朗时大姐、二姐（大伯父母的两个女儿）和我常常上去玩耍眺望。

重庆南岸的山岭，江上往来的船舶都清晰可见。

陕西街房屋各处门上厅柱上有不少石刻或木刻的对联。

我现在尚能忆及的只有两副：其一是“谱传鄴国，派衍兰陵”。

另一副是“文习六经，武习七经，历代勋猷有师法；男修九德，女修四德，一家雍肃得光昭”。

民国二十六年秋末我避日寇，由北平经济南、汉口到重庆，在马家巷的旧宅暂住了一月余。

那时大伯父母早已弃养。

大姐二姐也都早已出嫁。

大姐夫蒲叔葆（名殿位，是曾任一九

九年十月中旬开幕的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的三弟）也已经病歿。

大姐带着一儿一女寄居于此。

畅话家常，不胜感叹。

陕西街怡丰号的旧址租给了宪兵第三团。

我曾在陕西街上走过一次，只好“过门不入”了。

怡丰号歇业，据我推测，有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是“庚子拳乱”以来全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形都在转变。

旧式的商业，无论其规模怎样宏大，逐渐不能应付新局势。

其二是怡丰号是一个纯粹“家庭”企业的组织。

萧氏族入志愿经商经过“学徒”式的训练而有成就的都可以参加业务，升任各分号的“老板”。

他们与雇用的店员并肩工作，但他们不是雇员而是“所有人”。

他们既然有决定业务方针的力量，他们的行动便直接影响业务的盛衰。

在开创和发展的时期，一些兼具“股东”和“经理”身分的族人大都小心谨慎，克勤克俭，努力工作

。但是后继的人丰衣足食，甚至“养尊处优”，忘记了前人创业的辛苦艰难，不仅不能尽心于业务，甚至沾染浮华，从事挥霍。

于是营业渐趋不振。

主持总号的族曾祖籀泉公相机立断，在辛亥革命的前两年决定停业。

正式停业的那天派人在一片爆竹声中把高悬在陕西街前门上“怡丰”两个金字的横额取了下来，结束了一百多年缔造成功的商号。

萧氏族大人多，但与我接触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房”的几位尊长和弟兄。

先祖母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

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颇为怜爱。

两位姑姑出嫁以后，他对我更加着意照料。

## &lt;&lt;问学谏往录&gt;&gt;

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时常领我到村中各处散步，一面走一面讲些往古名人的事迹。

走到村里的“市街”照例买一点糖果给我吃。

他逝世时得年不过六十一二岁。

某一天下午客人来访，他送客出门以后，端坐在中堂的椅上“无疾而终”。

童蒙无知的我还要拉他起来，带我同去散步。

大伯父自幼习商。

四十多岁的时候升任怡丰号重庆分号的经理。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职位。

他办事精明，交游广泛。

商界人很少不认识或不知道“三老板”。

（他有两个堂兄，冠侯和定侯。

因此他虽是先祖父的长子，却排行第三了。

）在怡丰号停业若干年前，他捐了一个“候补道”，并曾晋京“引见”。

当地的长官，川东兵备道，重庆知府，巴县知县，到任以后照例到怡丰号来拜访，此外也偶尔互相往来。

这种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声气的情形，在十九世纪以前尚不多见，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却逐渐普遍了。

有一位卞小吾先生在那时重庆唯一的报馆当主笔。

他尽情揭发当地官吏的“黑暗”，触怒了他们，被加上了“乱党”的“罪名”，逮捕入狱。

他的太太与大伯母廖氏夫人相识，到怡丰号来求救。

先伯父探明他并非乱党，便去拜访知府，代他疏解。

不料这一来反断送了卞先生的性命。

有人暗中指使管监牢的狱吏把他害死，却报称他“急病身亡”。

大伯父管教我甚为谨严。

记得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像一般淘气的儿童一样，时常嬉弄跳跑。

有一次被他看见了便叫我站住，严词谴责说：“这样没规矩，不像一个斯文人，将来只好去抬轿。

”后来见我读书尚知用心，有时候背着我称许我。

他曾说“可惜科举废了。

否则举人进士这孩子应当有份的。

”（他捐了道员之后，替我捐了一个“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岁送我进京去“就职”。

幸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无官一身轻”了。

）他不惜重金，延师教读。

虽然两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学，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培植我。

从我到崇庆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们都在家里读书。

民国三年的夏天我壮着胆向他表示，想去进新式的学堂肄业。

他当时未置可否。

但次年春末他便亲自送我到上海去投考学堂。

我的父亲与我接触的时间较短。

他似乎不曾参加怡丰号的业务。

他的生活事迹我所知道的实在极少。

光绪二十九年他也住在崇庆州怡丰号的住宅内。

那时他已续娶。

我跟着我的生父和继母在那里同住了两年。

当大伯父带着我去重庆时，先父继母仍留在崇庆，两年之后才搬到重庆。

当他三十二岁的时候，便因肺病病歿于陕西街怡丰号住宅内。

临终的前两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低声地嘱咐我，大意说，“大伯父要你过房承继，我当然很放心，但也很舍不得。

## &lt;&lt;问学谏往录&gt;&gt;

我平日时常出门在外，不能多照顾你，我现在追悔不及。

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读书。

你如愿意经商也好。

无论读书经商，总要脚踏实地，专心努力去做。

此外我望你将来成家立业，要看重家庭，看重事业，不要学我的榜样。

我多年来东走西奔，没有成就，于人于己都无益处。

”十二岁的我在当时不能完全体会这些话的意义，虽然也感到伤心落泪。

我虽不能做到他所期望于我的一切，但我此后几十年生活的方向多少受了他遗嘱的影响。

丧葬完毕之后，继母命我帮助清理先父的书札和其他遗物。

怡丰号某职员说“五老板”在堆栈中存有一个大木箱，并伴同我去开看，结果发现其中尽是在日本出版的《民报》。

这许多本的革命刊物究竟从何而来？

我无法知道。

先父是否与同盟会通消息？

或者他与同盟会并无关系？

这些刊物是由别人交给他代为存放？

平日和他来往的几个日本人是否与这一箱书有关？

这些疑问都无解答。

我当时童蒙无知，并不晓得《民报》是革命党的刊物。

我拿去给我们的廖老师（大伯母的异母弟）看，他说：“这是要不得的，快快拿去烧掉。”

”我因爱这些刊物的内容奇异，印刷精美，偷着留存了一套（第一至第四期）背着人翻阅。

其中不少“非常异义”看了不懂，不敢去问老师，只好存疑俟解。

七叔（在本房中排行第五）继大伯父任崇庆州分号老板。

我在崇庆州的时候日常和他见面。

他自己有四个儿子，但看待我同他们完全一样，买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样给我一份。

他虽然自幼参加怡丰号的业务，但对于传入中国不久的“西学”，尤其是“格致”发生了浓厚兴趣。

江南制造局和欧美驻华教士等所译著的格致书籍（特别是关于化学的刊物）他尽力收集，细心研读。

不久之后他竟能“无师自通”，作小规模比较简单的化学试验。

在崇庆州住宅中辟了一间较大的房屋作为他的试验室，罗列了许多化学药品和仪器。

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学方法酿造葡萄酒。

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汉口请专家鉴定。

据说其品质不在烟台张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竟有过之。

朋友们劝他出资设厂，扩大酿造，与张裕竞争。

他也同意，着手进行。

辛亥革命爆发，四川省内也发生了“护路”的风潮，大局动荡，筹备的工作便停顿下来。

民国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

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长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辈不经商而入仕的一位。

民国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

民国四年我到上海进学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

后来凡从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学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他家里度假。

在民国六七年间同时留住的多到六人。

加上他自己的四个儿子（长子伯昭曾留学日本和美国，短期从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学）

整整是十个人。

那时他已经从虹口搬到民厚里。

楼下的寝室都成了“学生宿舍”。

开饭时一老十少满满地坐了一大圆桌。



## &lt;&lt;问学谏往录&gt;&gt;

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严，期望他们也甚殷。

他气象严肃，不苟言笑。

我们对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间也大胆和他开玩笑。

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乐（我们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点心，回家晚饭时食量大减。

他老人家便说：“平常骂人不中用，说这是个饭桶。

假如一个人连饭都不能吃，那岂不是比饭桶还不如吗？

”我们肃然静听，心照不宣。

过后伯昭（我们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岁早死了）提议：“我们明天晚饭，一齐大显身手。

”果然，届时菜饭上桌，全体落座，他老人家举起筷子说，“吃罢”，这十名健将“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钟桌上的菜如风卷残云，一扫而空。

他忍住了笑，把厨子叫来说“菜不够吃，快添来吧。

”民国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华学校，他十分高兴。

听说我从上海到在崇庆州住宅中辟了一间较大的房屋作为他的试验室，罗列了许多化学药品和仪器。

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学方法酿造葡萄酒。

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汉口请专家鉴定。

据说其品质不在烟台张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竟有过之。

朋友们劝他出资设厂，扩大酿造，与张裕竞争。

他也同意，着手进行。

辛亥革命爆发，四川省内也发生了“护路”的风潮，大局动荡，筹备的工作便停顿下来。

民国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

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长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辈不经商而入仕的一位。

民国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

民国四年我到上海进学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

后来凡从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学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他家里度假。

在民国六七年同时留住的多到六人。

加上他自己的四个儿子（长子伯昭曾留学日本和美国，短期从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学）整整是十个人。

那时他已经从虹口搬到民厚里。

楼下的寝室都成了“学生宿舍”。

开饭时一老十少满满地坐了一大圆桌。

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严，期望他们也甚殷。

他气象严肃，不苟言笑。

我们对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间也大胆和他开玩笑。

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乐（我们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点心，回家晚饭时食量大减。

他老人家便说：“平常骂人不中用，说这是个饭桶。

假如一个人连饭都不能吃，那岂不是比饭桶还不如吗？

”我们肃然静听，心照不宣。

过后伯昭（我们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岁早死了）提议：“我们明天晚饭，一齐大显身手。

”果然，届时菜饭上桌，全体落座，他老人家举起筷子说，“吃罢”，这十名健将“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钟桌上的菜如风卷残云，一扫而空。

他忍住了笑，把厨子叫来说“菜不够吃，快添来吧。

”民国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华学校，他十分高兴。

听说我从上海到北京（后来改名北平）的路费还没着落（大伯父远在重庆），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买好火车票，并给我一些零用钱。

<<问学谏往录>>

民国九年夏天我在清华毕业，回到上海，准备赴美。  
他明知学校发给每名毕业生五百银元的治装费，却另外给我百元，表示他对我的奖许。  
我上船的那天，他又亲到码头来送我。  
不幸他在我回国的前两年病故。  
十五年秋初回到上海，我只能到他的墓前去“拜见”他了。

## &lt;&lt;问学谏往录&gt;&gt;

## 编辑推荐

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至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

……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

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学者”、“思想家”的错误假设，非同小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

……“粗浅的实用主义”是中国教育停滞的一个主因……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但难于产生优秀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现代国家应有的人才，甚至也未必能产生卓越的科学家。

……我以为缺乏为工作而工作的“敬业”精神，是中国“国力”不充实的一个主因。如果国人能够忠实地为做官而做官，为当兵而当兵，为读书而读书，为游戏而游戏（可怜的中国人，往往连游戏也有另外的目的）……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